

企业家与体制改革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REFORM

王念祖

一、导 言

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划时代的宏图伟业，举世瞩目，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对整个世界发展的道路和前景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有关体制改革的著述已为数不少，但对企业家方面的研究和评价则不多见，因此对企业家的概念和素质亦很含糊。这是一个缺陷。

在有关体制改革的主要文件中，虽然确认企业自主是关键性的，可是对企业家的作用，没有象经济师、会计师、工程师那样给予应有的重视，很少提到。本文特就企业家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探讨，不求定论旨在略填空白，以激励各界人士的注意和研讨。

二、企业家的概念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家的身份是比较明朗的。

第一，企业家不等于资本家。拥有资本的业主，特别是投资者，对于投资的对象，如股份等，有时当商品一样对待，可以说是没有情感的，看涨时可以购入，看跌时又可以抛出，对于企业的战略和经营，一般并不直接插手干预。企业家则不同。当然，资本家也可能同时是企业家。

第二，企业家也不等于经理或厂长。如果相等，那么企业家就多得不计其数了。当然，企业家要懂得用人，对细节也不能忽略，但是对具体问题不需事必躬亲。

第三，企业家的主要任务是创新（Innovation）但创新不等于发明（Invention）或发现（Discovery）。例如，日本的企业家虽然雄霸世界的照相机和录音机市场，但这些产品多数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因此，企业家也不等于发明家。当然，现代企业，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的企业，有许多发明是企业内部研究所得

的成果。

第四，企业家虽然必需创新，但并不一定是在尖端技术领域里。例如麦当劳公司的主要产品不过是汉堡牛肉而已，这种食品人人会做。这家公司之所以非常成功，在于为顾客设想得无微不至；在生产方面要绝对保证每个汉堡的标准化，包括含量、温度、新鲜程度及清洁卫生，例如，交货给顾客时，如果与所要的货物稍有出入，就要立即投进垃圾箱。在推销方面，必需先做市场调查及试点；在管理方面也异常严格。凡此种种，不像火车、汽车、电子基因的发明，也谈不到甚么尖端技术，但是与第三产业的崛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面的例子说明，所谓创新并不一定是指史无前例的全新创举，例如中国要能够结合国情，善于运用先进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虽然许多方面，迹近摹仿，在中国亦是创新。

更进一层，创新的每一小部分，看来似乎没有甚么惊人之处，但是其总和却不同凡响；因为别人不懂得把各部份汇集起来去成龙配套，反之，许多利用新发明的企业，失败率却很高，主要原因是某些部门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第五，企业家既要创新，就要冒风险，但是不等于投机家。投机家只能利用机会不能制造机会。而企业家虽然也要识时务，可是主要不是等待机会的来临而是创造机会。例如，投机家看汽车工业会发达，决心借钱大买汽车公司的股票，希望他的看法是对的，而企业家如汽车工业的创始者福特，却是制造了对汽车的需求，没有他的创新，汽车市场根本不存在。

第六，企业家是否是天才家，这是有争论的，一般言之，企业家的远见卓识，不折不扣的精神、不同凡响的作风、赴汤蹈火的毅力，不像会计师、工程师那样可以按部就班地训练出来。在美国的商学院中，

王念祖（N. T. Wang）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兼任教授。

对是否能训练企业家这个问题,常有讨论。近几年来,许多院校开办了《企业家》的课题,但其目的主要是介绍如何开办小型企业,为不愿寄人篱下的人寻找一条出路,所以,这种训练是有局限性的。

历史上,多数的大企业家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即使教育程度高的人,他们在企业上的成就,不见得与他们所学的专业,如科学、哲学、文学等,有紧密的关系。有人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班出身的人,反而不容易成为企业家。相反,南洋有许多华裔企业家,他们大多学历很浅。欧洲的企业家,许多也不是上层社会出身的,更不是商学院的高才生。有一个英国的大企业家说,他大学没有毕业,但是他相信,如果他受过高等学府(如牛津、剑桥大学)的熏陶,恐怕不会走企业家这条路了。当然,企业家中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甚至也是发明家。

既然企业家不一定是培训出来的,任何一个社会也不能说没有足够的人可能成为企业家。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企业家的天赋,而是社会是否允许企业家成长和发展。

三、体制改革怎样替企业家创造条件?

企业家在中国尚未受到应有的注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企业家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角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好像不适用,甚至不可能存在。作者的老师熊彼得就有这样的看法。他阐明了企业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担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按步就班,企业家难以产生。二是把社会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企业的任务无非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而已,不需要创新。因为创新往往与原定计划不合,对指定任务有冲击。即使达到创新的目的,由于是计划外的任务,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管理人员很少有创新的积极性。即使他们锐意创新,但手脚受绑。例如,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技术人员、工人和机器厂房、零配件及销售渠道,都是问题。所以他们大多知难而退。

从理论上讲,在指令性计划的制度下,创新的动力可以发源于最高当局,他们可以起企业家的作用,但是事实上不容易贯彻到基层。

自从中国推行体制改革以来,虽然制度尚未完善,且潜在的问题甚多,但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最显著的是个体户及小型集体企业蓬勃兴起,其活力之大,干劲之足,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之企业家也不相上下。所不同的是其活动范围和它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比重有限。许多成功的个体户,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提心吊胆的不敢进一步的发展,以免带上资本家的帽子。

因此,当今中国的问题已不是应否或能否有企业家的问题,而是如何创造条件使企业家能够成长和发展的问題。

(一) 企业自主权

最重要的措施,当然是彻底扩大企业自主权,特

别是消弥中小企业的余悸以及给予大型国营企业以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比采用南斯拉夫的工会制模式较少流弊,因后者往往偏重工人的眼前福利,忽略企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导致高工资、高消费、低积累、纪律松懈、通货膨胀等后果。但厂长负责制应当是更广义的经理制,因为经理的职责范围比较广,同时适用于各种活动,包括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增加,即使是制造业,大多数也不一定是纯粹的制造业,而可以多种经营。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也有财务服务部门,日本的大商社,更是包罗万象。

在体制改革中,规定政企分家以后,经理人才的遴选是一个新的课题。注重学历及考试成绩,比起毫无标准凭藉关系来选拔人才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即使让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家参加这种考核,恐怕大多数人也要不及格。所以将来遴选企业领导的制度,重点应放在办理企业的实绩上,不能仅以一纸文凭或考卷为准,因为书本上的学问与实践是有距离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工人的晋级与升迁。

用合同制取代已往的终身制也是好事,但硬性的短期(4~5年)委任经理也不无流弊,在这种情况下,经理往往集中力量图谋急功,如讨好员工、任内多分红、多盖房屋等,缺乏长期打算。这对创新是特别不利的,因为创新往往需要充分准备,方能得到最后胜利。

(二) 赏罚的分寸

打破了铁饭碗,亦即取消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如果企业的经营发生严重问题时,可以破产倒闭。中国正在起草的破产法是合乎逻辑的。少数地区已开始作为破产法的试点,这是一种稳健作法。

破产法既要考虑企业的成败可能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如物价结构的不合理等,又要顾及到企业破产后对社会的影响。有问题的企业,由官方通知限期改善财务情况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的措施,一旦体制完备,就无须用行政手段干预。如果周转失灵,自然就会倒闭,但挽救办法也是相当多的。例如,如果有人肯注入新资金,像输血一样,企业即使在短期内营业不能好转,也可渡过难关,不必关停。有时要把管理人员撤换、机构改组,或把一部分资产出售,甚至全部转让或合并。有的时候,即使企业破产,象将军打了败仗一样,管理人员有责任,但不一定声败名裂,还可能东山再起。

替企业家创造良好环境,必需允许非常成功的企业成长扩展。因此,对个别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宜硬性限制,对扩大商品及地区的范围也不宜严加室梏。例如,在西方几万元的小本经营几年内有可能成为几亿元的大商号,可口可乐公司认为可以发展服装业,政府也不加干涉,即使它要并吞其它汽水公司或装瓶设备厂,除非超过全国总销售量的若干百分比,有垄断迹象时,政府也不予限制。许多公司对外发展成了跨国公司。

(三) 减少阻力

要使中国的企业家有积极性,除了上面所说的条件

外,社会上首先要治红眼病,防止各方面抽血割肉和妨碍企业的积累。根据各国的历史经验,企业利润的再投资应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开辟这一财源。企业的利得税率不宜过高。

企业外来的资金用银行贷款代替财政拨款,是体制改革的一环。但是在抽紧银根时,贷款金额如果用一刀切的办法,一律限额,对企业家是不利的。

股票市场与风险资本及非银行资金,也需渐次开源,以搞活资金。企业的财务情况也必须明朗化,这有赖于会计制度及标准的确立,不然企业的实际情况外界很难洞悉。

(四) 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是否也需要有企业家,颇多讨论。一般地说,公共事业活动的目的不是营利,是与创新格格不入的。第一,公共事业要满足用户(Constituencies)的需要,如果要创新,因新的事业尚没有用户,而且对旧有的用户不一定有利,容易遭到反对。第二,公共机构的目的有时是难以达到的。例如,治安机构的目的是减少犯罪,但如果达不到目的,犯罪率上升,治安机构的预算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增加。

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共事业机构,如教育卫生等,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也要打破官僚化,讲求创新,因此也需要企业家。例如,商学院就时常设有非营利事业管理课程,以培养这类人员。公共事业也经常物色成功的企业家作领导。若干国家发现公共事业也可以私有化。如委托私营公司处理垃圾一类的事项,较公办的效率为高。这种经验,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五) 企业家的代价

当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企业家的成功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熊彼得说得好,企业家的活动会产生“创造性的破坏”,意思是说,创新者的成功即是陈旧者的失败。有如新陈代谢,优胜劣败。这种情况就像战争一样残酷无情,有“一将成名万骨枯”之感。有人认为,与其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不如墨守成规,以减少麻烦,避免动荡。但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的现代,不创新难以在世界上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不创新是不行的,在创新中被淘汰的企业和辞退的工人,应当有安全网,社会保险、失业保险、转业训练等,以减少困苦,在进步中求稳定。创新中对环境的破坏也必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六) 企业家与中国的前途

总之,企业家与中国的前途与体制改革的进展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体制改革,企业家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体制改革如果不完善,即使有了企业家,也很难大大发挥,而且其社会代价可能是相当高的。另一方面,企业家如能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不仅为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创造条件,而且可以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新环境,新社会。

这个新社会将会彻底改变“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做了官不但

名利双全,而且有生杀之权;官可以使任何一种活动进行不下去,例如作家的文章可以被禁止发表,音乐家的音乐可以被拒绝演奏,企业家的命运也在官的手掌之中,相反,官的命运却不能受老百姓的支配。

因此,要使企业家有驰骋之地,无后顾之忧,政治改革也是必要的。主要是要限制官的权力,要厉行法治。这样大家就不会为争做官而勾心斗角地要把别人挤下去。企业家的路子是广阔的,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各显身手。在这种新社会里,其他的一切行业,如文艺科学都可以吸引人才,各有建树,同时消除做官热与恐官病。

(上接第70页)

大学的理科的课程分量比麻省理工学院重,因此该大学能够更多地开拓一些新兴的学科,并不是偶然的。麻省理工学院则更严谨一些,专业训练也多一些。

二、对中国工科高等教育的 一些看法

1. 要加强工科学生的物理训练。工科要有较好的物理基础,这是绝对必要的。聂先生举例说,中国派到美国的理科方面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知识结构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在考试方面,往往比美国学生表现更好,只是死板了一些;而工科方面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就不太适应,甚至国内的一些一流的理工科大学派出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主要是物理基础不够,专业面太窄。

2. 国内的企业界对物理不重视,不喜欢要物理系的毕业生,这是不妥的。物理基础好的人,喜欢想问题,爱探索,因此可以促使技术向更高和更深的方向发展。

3. 国内的大学过早地确定学生的专业方向是不利的。要十七、八岁的孩子选择专业来决定自己终身所从事的工作是不妥当的。他们刚入大学时对自己的能力和各个专业的情况并不都了解,因此理工合校,三年级再进入专业有它的优越之处。

4. 现在搞的CUSPEA* 缺点很多,使学生心思不在国内,也不在社会,而只是想着出国。有的大学甚至停掉了一些课程的学习,而对考CUSPEA的学生搞专门的辅导,这样做把物理的教学安排也给扭曲了。

5. 国内的理工科大学应该分出层次,不要按同一个标准要求。象清华、交大这样的大学,要培养高层次人才,而不是培养只搞具体设计和画图的人。这一类的工作可以由较低层次的人才来承担,这也是社会的需要。5~10年后,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层次的区别就更加需要了。

6. 国内的教育动得还不够。动态的概念是很重要的,苏联的教育缺点就在于静态的。中国的经济已经由静态向动态过渡,但是教育上动得还很少,改革的步子还不大。

* CUSPEA是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的我国赴美留学的研究生——本刊注。